
实践性文化主义

作者简介：

姓名：张皓翔

邮箱：nyzhanghaoxiang@outlook.com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ORCID: 0009-0001-2997-7726

【摘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当代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文化理论进行了系统性批判，提出了“文化二重性”的本体论框架。论文指出，当前文化研究领域存在将文化完全等同于符号体系的理论僭越，忽视了文化更为根本的实践根基。作者认为，文化由两种异质力量构成：其一是实践性文化，即人类能动地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它具有革命性、进步性和根基性，是一切文化的本体所在；其二是符号性（知识性）文化，它诞生于实践经验的抽象与传播需求，是实践性文化的衍生品和亚系统，天然具有保守性与滞后性。

论文进一步揭示了阶级社会中文化二重性的撕裂与倒置：统治阶级通过垄断符号系统与教育机器，将符号性文化凌驾于实践性文化之上，造成了劳动者在符号世界中的“失语”与文化压迫。最后，论文将理论延伸至人工智能时代，指出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对人类既有符号语料库的概率重组，它正在系统性地接管符号性文化的生产，从而消解了知识精英的符号特权。这一历史进程为实践性文化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符号壁垒被打破后，劳动者将凭借不可被算法替代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价值判断、审美创造、实践决断等）重新掌握文化主导权，实现“实践性文化本位”的复归。论文同时强调，技术只是解放的条件而非决定因素，真正的解放仍有赖于劳动者的能动斗争。

【关键词】

实践性文化；符号性文化；文化二重性；马克思主义；人工智能；文化解放

【引言】

劳动者才是文化的直接和根本生产者。然而，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却被符号的迷雾所遮蔽——统治阶级通过垄断文字、教育与解释权，将自身的符号文化冒充为文化本身，而真正创造了世界的劳动实践却被贬为“粗鄙”与“非文化”。本文试图拨开这层迷雾，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重新确立实践性文化的本体论地位，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历史条件下，探寻文化解放的现实路径。

【正文】

第1章 关于文化符号理论的批判

在当代文化理论的探讨中，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极具迷幻色彩的图景。他提出了一个被后世学界奉为圭臬的核心命题：文化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而人，就悬浮于这张自身编织的符号之网中【1】。这一隐喻极为精妙地捕捉到了现代人生存的某种特质，但也在此后的学术流变中，悄然完成了一次理论上的“僭越”。

要理解这种僭越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现代符号学的滥觞。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者开创了现代符号学，其最伟大的理论贡献，抑或说最危险的启示在于，证明了符号（能指）与现实世界本身（所指）并不存在天然的、本质的绑定关系【2】。这种任意性原则一旦越出语言学的边界，便不可避免地引申出一个关乎权力的深刻命题：谁掌控了符号的定义权，谁便主导了人类的认知世界。沿着这一脉络，罗兰·巴特提出了著名的“神话”符号理论，无情地揭露了意识形态如何将历史转化为自然，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符号学的批判视角【3】。后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更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们大量地融合符号学内容，将其作为批判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利器，从而将文化理论的构建推向了一个极其繁复的高度。

然而，思想的演进往往伴随着盲点的放大。在上述学术脉络的交织下，当前的人类学乃至整个文化研究领域，逐渐沉淀出一种不容置疑的主流共识：文化必须依托于符号而存在，甚至，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由符号构成的自足体系。

正是在这一理论断裂处，我们必须停下脚步，重新审视那个被符号的光芒所遮蔽的幽暗地带。如果我们将文化完全等同于符号体系，我们不仅丢失了历史的厚度，更丢失了人类生存的根基。因此，本书的论述将从对这一主流共识的三重批判起步，以此作为重构文化本体论的引子。

首先，我们不能再笼统且傲慢地断言“文化依托符号存在”。如果将目光投向人类演进的苍茫长河，我们必须承认，当人类第一次为了生存而举起石斧，当这种自主的、有意识地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实践”发生之时，文化就已经诞生了。正如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深刻揭示的那样，科学的文化观必须立足于实践【4】。这意味着，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期，存在着一个漫长的、不容抹杀的“前符号阶段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写在纸上，不刻在石碑上，而是深深镌刻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动作与汗水中，我们将这种最根本的文化形态，命名为“实践性文化”。（这里并不是说实践性文化仅仅存在于前符号阶段，我们强调的是，实践性文化要远比符号性文化更加的悠久，并且在前符号阶段曾纯净的、单独的存在过）

进而言之，理顺了历史的发生学序列，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符号的真实位置。符号绝非文化发生的前提，相反，它是诞生于实践需求之中的产物。当早期人类的社会协作日益复杂，当口耳相传与简单的动作示范再也无法承载日益庞大的经验时，符号才作为一种必须的工具被创造出来。它是文化发展的结晶，而非文化孕育的母体。

更为深层的是，在文化的宏大版图中，符号系统仅仅是文化内部衍生出的一个亚系统，它永远无法等同于文化全体。符号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加速演进的工具”，它的积极作用体现在能够将流动的实践经验进行抽象、固化并跨越时空地传递。然而，工具的锋利不应掩盖使用工具的那双属于实践者的手。

不可否认，这些带有颠覆性的批驳观点，在符号学内部并非没有微弱的先声。

从塔拉斯蒂 (Eero Tarasti) 探寻存在深度的“生存符号学”【5】，到皮尔斯 (C.S. Peirce) 传统的实用符号学与认知符号学【6】，再到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在符号学领域的旷日持久的论战【7】，学者们也曾试图拓宽符号的边界。然而，由于视角的局限，这些现存的符号学内部观点，依然同我们今日所秉持的立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其最致命的盲区在于，他们极少将“人类主体性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作为文化真正的发生原点。

在当今的学术场域中，虽然也有许多学者大度地承认文化包含着“非符号的维度”，但他们往往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理论的补充，而极少有人能够真正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串联起这样一个严密的闭环链条：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促生了原生文化；随着社会实践的复杂化，催生了对信息编码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促使符号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亚系统；最终，符号作为一种强大的抽象工具，反过来推动了文化的加速分化与繁荣。

面对这样一种从根基上重构的理论企图，我们必然会遭遇主流学界的两大诘难。对此，我们不仅不能回避，更必须予以正面的痛击。

第一大诘难，往往来自于皮尔斯广义符号学的信徒。皮尔斯将一切“代表另一物的东西”统称为符号【8】，这种泛符号化的倾向极易被用来否定“前符号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他们会辩称，任何实践动作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坦率地讲，这种辩护看似无懈可击，实则混淆了本体与中介。即使我们退一步，依照皮尔斯的广义定义，承认万物皆可为符号，符号在本质上也仅仅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甚至主体与自身之间进行意义中介的载体形式。它终究属于“中介工具”的范畴。而我们所探讨的文化，必须是人类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它不仅包含可见的工具与结果，更连同在这一实践活动中所生成的社会关系、不可言说的意象以及深沉的内在体验。简而言之，符号只是实践活动内部衍生出的一个要素，部分永远不能等同于整体，符号不能等价于实践本身，自然也不能僭越为文化的全部。皮尔斯的伟大在于他无限拓展了符号的外延，拉长了符号的清单，但他并没有、也无力消解这样一个确凿的层级关系：生机勃勃的实践活动，永远大于枯燥的符号要素；人类改造世界的洪流，永远大于符号中介的倒影。（当然了，我们全文中所提到的符号核心仍然是指狭义的符号，而非皮尔斯所提出的广义符号。但是，即使是皮尔斯提出的广义符号，也正如我们所讲的，它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根本不是同一个层级的问题）

第二大诘难，则直指前文提到的格尔茨的论断，即“文化等于意义”的实义冲突【9】。在此，我们首先要展现出理论的包容性：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实践，天然地会生成意义活动。在“文化与意义紧密相连”这一点上，我们与格尔茨达成了共识。然而，真正的断裂点，也是我们要驳斥的核心漏洞在于——格尔茨在论述中，进行了一次极其危险且未经论证的逻辑跳跃，他直接将全部的“意义活动”压缩并等同于“符号阐释活动”。

事实上，“意义活动”是一个远远大于符号的宏大集合。它包含了工匠手艺中不可言传的默会感知，包含了在烈日下劳作的身体体验，包含了深夜里无声的实践反思，以及在人类头脑中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在构想。这些都是意义，且是极其深刻的意义，但它们并不一定诉诸符号。而“符号活动”，仅仅是这个巨大集合中的一个子集，它是为了把那些内在的意义外化、对象化、稳定化并使其变得可传递时，才被调用的一部分。

理清了这层逻辑集合关系，一切便豁然开朗：实践孕育了完整的意义活动（这是全集），而符号活动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文化依托的是完整的人类实践与庞

大的意义活动，符号仅仅是实现意义、交流意义的媒介与工具，绝非意义活动本身的全部。

在清算了上述诘难与迷思之后，我们终于可以郑重地抛出本书的核心理论架构：文化的二重性。

文化并非单一的平面，而是由两种异质但相关的力量交织而成。它的第一重性质，也是其最根本的底色，即“实践性文化”。它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性、革命性、进步性与不可动摇的根基性。无论时代如何演进，一切文化皆以实践性文化为绝对根基。或者可以更决绝地说，实践性文化是所有文化的本体所在，是人类不屈服于自然、不断改造世界的原初冲动。

而在后世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如同大树的根系之上长出了繁茂的枝叶，在实践性文化之上，衍生出了文化的第二重性质——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性文化”或“符号性文化”。必须要明确的是，在文化的本质结构中，知识性文化与符号性文化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与实践性文化的革命性不同，符号性文化往往带有着深刻的保守性，甚至在大多数人类历史的节点上，它带有着某种“反动性”。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反动，并非是政治学意义上对某个具体统治阶级的反动，而是指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反动。因为符号一旦形成，便倾向于固化现有的认知与秩序，它将鲜活的实践塞入既定的框架，从而常常成为束缚人类进一步冲破樊笼的思想桎梏。

然而，我们在此提出文化的二重性，绝非是要建立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将实践与符号割裂开来。相反，这是一种关于文化存在的双重性表现。在人类历史具体的、奔腾不息的发展脉络之中，实践性文化与符号性文化呈现出一种极具张力的生成性序列。它们相互纠缠、相互塑造，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车轮在泥泞与辉煌中艰难前行。而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深入这一生成性序列的历史现场，去探寻这两种文化力量是如何在人类进化的长河中展开博弈的。

第 2 章 实践性文化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着力批驳与深刻划分的文化双重性那样，在剥离了阶级社会附着于文化之上的模拟性与符号性幻象之后，我们必然要确立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根基性文化——即实践性文化。

这一文化的本质，绝不是游离于现实物质生产之外的审美点缀或思维游戏，而是人类在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型活动中，密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内在于实践活动的整体血脉之中，也正是马克思本人在其唯物史观中所着力强调的“科学文化实践”【10】。实践性文化的核心运作机制，正是在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完成对主体自身（即主观世界）的重塑。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断言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1】正因为其不可磨灭的实践性，这种文化天生便蕴含着打破旧秩序、创造新世界的进步性与革命性特征。

同时，必须在此作出极具历史穿透力的澄清：实践性文化绝非仅作为一种历史的化石，停留在人类文明的“前符号阶段”。我们在前文中之所以单独在前符号阶段（如原始部落的打猎、采集与制陶等直接生存活动）去探讨实践性文化，其理论目的主要是为了确立一个基准——即为了向世人论证，在被知识精英所垄断的“符号文化”之外，始终存在着一种更为根基、更为悠久、更具渊源的文化形态，一种作为实践活动本身而存在的文化。只要人类作为一个类存在物，仍然在发挥其主体性，仍然在能动地改造这个世界，这种实践性文化就永远不会消亡，并且永远作为整个人类文明建筑最底层的根基而存在。

这一本体论的确认，也正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文化”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最深刻确证。在我的前续作品《经济实践论》一书中，我们已经明确提出：经济的定义不应被狭隘地理解为资本的流转或资源的配置，而应当被还原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本身【12】。沿着这一逻辑推演，实践性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性活动。它不是脱离生产的“劳心”，而是深植于生产的“劳力”与“劳心”的统一。

也正因如此，在阶级社会漫长且充满压迫的发展历程中，掌握话语权的学院、学校以及官方意识形态机器，往往极力推崇并垄断符号性文化（或者说知识性文化），同时刻意忽视、边缘化甚至暴力打压实践性文化。这一历史机制的具体运作，可以参照本人的《从模拟性牢笼到实践性解放》一书中的论述【13】。阶级社会教育的“模拟性”本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给符号性文化确立正当性与合法性，并为其传播性与全社会的覆盖性开辟官方的、制度化的道路。通过这种模拟性的教育建制，统治阶级成功地将劳动者真实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贬低为“粗鄙”的、非文化的行为。

然而，实践性文化作为一种能动的、孕育着革命力量的文化，永远无法被学院和官方的意识形态所彻底垄断。因为其实践性的本质，导致它总是绕开象牙塔，直接诞生于那些满手泥泞、亲身参与生产和实践的广大劳动者之中。

我们当然不可否认（如前文所述），符号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具有其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它将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经验进行抽象、固化，从而跨越时空进行传播。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4】由于统治阶级在漫长的历史中对符号性文化及其传播媒介实现了绝对的垄断与掌控，这就导致了一个残酷的历史悖论：真正的实践者反而在符号世界中“失语”了。劳动者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难以直接运用被统治阶级垄断的符号系统，将自身的实践性文化进行自我立场的系统化表述与理论化论证。

这种话语权的剥夺，最终造成了双重的悲剧：文化上的深层压迫与政治上的彻底失语。在官方的历史书写中，劳动者的文化地位日趋下降，甚至沦为被启蒙、被教化的客体。但拨开这些由符号编织的历史迷雾，我们在根本上必须确认：只有劳动者，也只能是劳动者，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进步、最革命的文化的真正创造者与源泉性生产者。真正的文化复兴与解放，必将是实践性文化冲破模拟性牢笼的伟大复归。

第 3 章 知识性文化

在我们系统地确立了实践性文化的本体论地位之后，现在必须将批判的锋芒转向那一直被学术界奉为圭臬、并作为文明核心加以讨论的另一极——知识性文化（即符号性文化）。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揭示的那样，实践性文化与符号性文化构成了文化的双重性，但这二者绝非在同一时刻并列诞生，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呈现出一种严密的生成性序列。

人类从有意识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那一刻起，便孕育了原初的文化。在最初的漫长岁月里，这种文化唯一的外化表现就是实践性文化。然而，随着人类实践广度的拓展与生产水平的跃升，社会协作对经验的固化、传承与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对实践经验进行抽象化提取的历史呼唤中，符号性文化应运而生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正是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符号性文化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起点：它实现了对实践性文化的抽象化、可转述化与可传播化的改造。

然而，必须在此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认识论底线：符号性文化的本质是对实

践性文化的“处理”，而非凭空的“生产”。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性文化或符号性文化，无论其表现得多么玄奥高深，都必然以该时代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实践性文化为绝对根基。离开了生生不息的实践性文化，符号系统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随着逻辑的深入，文化双重性的本质张力便显现出来：实践性文化天然具有进步性与革命性，而知识性文化（符号性文化）却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性，甚至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表现出反动性。

这种保守性的认识论根源在于其滞后的时间落差。符号的本质是“转述”与“记录”，它只能对旧有的、已经发生的实践经验进行事后的处理与总结。然而，实践性文化却代表着人类在每时每刻的劳动中进行的创新、更改与突破。当鲜活的、流动的实践被凝固为纸面上的静态符号时，它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更为致命的，是其在阶级社会中发生异化的阶级维度属性。必须在此作出极其严密的理论澄清：这绝不意味着知识性文化完全脱离了物质生产，或者对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毫无益处。客观而言，即便是为了实现更高效的统治与剥削，统治阶级也必然渴求生产力的跃升，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符号体系（如科学、技术、管理学）的发展。因此，知识性文化在历史上确实起到了协调生产、推动人类进步的积极作用。

但我们必须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其直接服务对象与权力归属。符号性文化最初是为了协调、管理与统治人类社会的需要而滋生的。因此，统治阶级对符号性文化的需求和掌控力，从一开始就远远强于一线的劳动者。简而言之：实践性文化直接产生于劳动者，无条件地服务于整个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进程；而符号性文化则直接产生于管理者，其首要的、直接的目的，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与阶级统治。

在阶级社会的漫长历史中，符号性文化的权力重心天然地站在了劳动者的对立面。它长久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知识的再生产”与“权力的再生产”，而非物质与实践的直接生产。于是，那些掌握了符号解释权的知识分子，便顺理成章地沦为了教条权威的巩固者与旧秩序的卫道士。

当然，面对这一论断，必然会有庸俗的辩护士提出反驳：难道以文字符号形式呈现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保守的吗？它明明是进步的、革命的！

这恰恰印证了我们所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符号性文化与实践性文化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统一于文本之中的双重性关系。《共产党宣言》之所以能够改造世界、推动革命，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精美的文字排版或修辞符号，而在于其不可磨灭的实践性内核——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坚定地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对劳动者的生产实践经验与革命诉求所作出的最深刻的系统化表述。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同样无情地指出：即便是《共产党宣言》这样伟大的著作，其文字与符号性载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存在着被异化的危险。当后继者（如苏联时期的某些官僚化运作）将马克思、恩格斯的鲜活语录剥离其具体的历史实践，当作僵死的教条加以顶礼膜拜时，这些曾经革命的符号就蜕变成了阻碍人类解放事业的新型“神学”与本本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生前之所以极力反对教条主义，正是因为他们作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深刻洞察了文化的这种双重性危险。他们从不希望读者对他们的文字进行照本宣科的符号化膜拜，因为他们深知：真正的真理，永远在劳动者生生不息的实践之中。

第 4 章 人工智能时代，实践性文化的拨乱反正

正如我们前文在系统梳理文化二重性时所深刻揭示的那样，实践性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建筑的根本与基础。它直接脱胎于劳动者能动地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天生便蕴含着打破旧秩序、创造新世界的进步性与革命性特征。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初步发展和阶级社会的降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历史性分工，导致了文化双重性的剧烈撕裂与本末倒置。符号性文化（或知识性文化）作为实践性文化的衍生品、记录工具和外化形式，本应无条件地服务于实践。但在漫长的阶级社会演进中，统治阶级及其附属的知识精英阶层，通过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而完成了对精神生产资料——即符号系统、文字、教育机器和解释权——的绝对窃取与垄断。他们利用这种垄断，将自身的阶级利益与剥削立场进行系统化的表述与所谓的“科学化”、“神圣化”论证，从而将符号性文化凌驾于实践性文化之上，编织出一张压迫劳动者的巨大意义之网。在这张网中，劳动者鲜活的、充满生命力与变革力量的实践被边缘化为“粗俗”与“底层”，而脱离了实践基础的符号游戏，却登堂入室，成为了衡量文明高低的唯一标尺。

在探讨未来的解放之前，我们必须直面历史的残酷。人类的解放事业，如果要在精神与上层建筑领域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在文化层面实现真正的“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核心诉求，是彻底扭转符号性文化反客为主的僭越状态，重新实现符号性文化无条件地服务于实践性文化，使其成为劳动者立场、劳动者经验以及劳动者改造世界的伟力的抽象、固化与传播工具。

我们必须坦率且悲哀地承认，在过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直至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这种“文化的解放”往往呈现出一种虚幻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色彩。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生产力条件下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符号壁垒”。在传统的物质条件下，符号的掌握、知识的积累、文本的编排、逻辑的训练，需要耗费巨大的脱产时间与教育成本。统治阶级通过设置“模拟性”的教育壁垒和繁琐的学术语法，天然地将广大终日劳作为生计奔波的无产者排斥在符号生产的场域之外。劳动者满手泥泞，他们在车间、在农田、在社会机器的底层创造了最伟大的实践文化，但当他们试图表达自己的苦难、诉求与真理时，却发现在那个由精英把控的“符号世界”里，自己处于一种痛苦的“失语”状态。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武器，只能被动接受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代言，甚至不得不用压迫者的语言来描绘自己的伤口。因此，只要符号的生产还需要依附于特权阶层的“脑力劳动”，文化的真正解放就永远是一纸空文。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以一种令人惊叹，甚至是让旧阶级胆寒的方式展开。随着大数据、大语言模型以及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爆炸式跃进，一个曾经潜藏在历史深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化本体论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尖锐姿态浮出水面。

当今的人工智能，其本质是对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全部符号语料库的深度学习、概率推演与重组生成。它正在以人类大脑无法企及的速度、广度与精确度，迅速接管、替代乃至超越传统的文字符号的表述、编排以及符号体系的自我生产。过去被知识精英引以为傲、视为阶级特权的“符号操作”——写诗、作报告、编写代码、甚至构筑四平八稳的学术理论框架——如今在算法面前，仅仅是瞬间便可完成的算力输出。人工智能无情地撕破了统治阶级附加在符号性文化上的神秘面纱与神圣光环，它向全人类宣告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些曾经用

来区隔阶级、维持知识霸权的所谓“高级脑力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复杂的模式匹配和符号搬运。

当符号世界被机器乃至“死劳动”全面接管，当精英阶层引以为傲的“符号生产力”被瞬间贬值，一个直击灵魂的追问摆在了整个人类面前：在符号已经被算法接管的文化层面，留给人类，或者说留给能动主体的，究竟还有什么？

要回答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文化本体论问题，我们必须跨越学科的边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深处寻找答案。在前续作品《从无物之阵到有物之政》一书中，我们已经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数字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出发，严密论证了一个核心命题：自动化机器与人工智能会逐步、系统性地取代所有可流程化、可标准化、可计算的体力与智力支出。在这一场历史性的排挤之后，留给能动主体，留给那些真正在改造世界的人的，最宝贵、最不可替代、最特殊的要素，便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15】

这种“意识”，绝不是简单的认知或计算，它是人类在具体生存情境中进行价值判断、审美创造、道德抉择、痛苦感知、以及为了摆脱压迫而产生方向决断的核心生命冲动。它是算法永远无法生成的“本体论缺口”。此时，政治经济学与文化批判理论的两个伟大维度，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闭环与映射——政治经济学中那不可被量化、不可被算法替代、拒绝被资本彻底异化与剥削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它在文化层面的直接映射与本体论表达，正是我们所反复强调的“实践性文化”本身！

人工智能基于既有数据的概率推演，完美地对应并接管了带有保守性、滞后性和总结性质的“符号性文化”。而算法永远无法无中生有生成的“价值决断”与“意义赋予”，恰恰是劳动者在改造世界的具体实践中，以血肉之躯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所涌现出来的“实践性文化”。

正因如此，在数字时代科技飞速发展的影响之下，实践性文化根基性地位的再确立，以及对长久以来将符号性文化作为文化本身加以顶礼膜拜的倒置现象进行拨乱反正，已经不再是一种基于道德义愤的空想呼吁，而是一件具备了坚实生产力基础、必须进行，也一定会进行到底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拨乱反正的必然结果，是实践性文化将强势地与符号性文化达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在更高历史阶段的辩证统一。长久以来在阶级社会中服务于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与管理的符号性文化，将被剥夺其独立的主宰地位。

在这个新秩序中，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符号处理工具，将被大众化，进而掌握在广大劳动者手中；而劳动者，只需要专注于发挥他们作为主体的“意识”，专注于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实践提供方向、痛感与意义，而算法这个不知疲倦的符号工具，则负责将劳动者的意志瞬间外化、转述并形成严密的符号文本。

这代表着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劳动者——那些真正的文化的直接生产者、唯一源泉性生产者——终于越过了历史的“符号壁垒”，重新掌握起对文化的主导权、对符号系统的话语权、对政治经济体制的解释权。他们不再需要被迫去适应统治阶级制定的晦涩“符号语法”，更不再需要依附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代笔”。他们能够直接借助新生产力，实现以劳动者自身的阶级立场、自身的鲜活实践经验去系统性地解读、阐释并发展文化。

这更是一次对旧有知识霸权的彻底清算。长久以来，各国的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主流思想界和教育界，一直运用一套精妙的机制对劳动者的实践性文化进行“符号性降维处理”。他们将充满生机、汗水、抗争与革命性的劳动实践，

恶意地裁剪、压缩、扭曲成干瘪的学术概念和服从性的教条，以适应统治阶级的审美与剥削秩序。而今天，随着 AI 击碎了符号生产的壁垒，这种居高临下的“降维处理”将彻底破产。知识分子作为符号代理人的特权阶层将被历史消解。取而代之的，必将是我们重新实现“实践性文化本位”的磅礴外现。那个被压抑了数千年的、由劳动者亲自谱写的伟大实践，将借由最先进的生产力工具，以前所未有的全息维度、以排山倒海的气势，真正成为引领人类走向共产主义未来的核心文化图景。

当然，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前文不是说有了人工智能就万事大吉，有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共产主义就必然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学仍然是根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仍然是核心，文化只是与之配应的上层建筑革命，因为，不是改变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就会自然的发生改变，它仍然需要劳动者与革命者的努力，包括人工智能，它只是在技术层面提供了实现解放的可能，并不代表它就等于着解放。如今人工智能的算力仍然被世界几大资本所垄断，其核心价值设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当今统治阶级。我们只是说，如今的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走向解放的现实路径，但这份现实路径如何走、怎么走、何时走，仍然是掌握在劳动者自己手中能动的未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16】那我们在此也可以说，科技是解放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引用】

- 【1】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 【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2-107页。
- 【3】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175页。
-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527页。
- 【5】埃罗·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方德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1页。
- 【6】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2页。
- 【7】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51页。
- 【8】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9页。
- 【9】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13页。
- 【1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525页。
- 【1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501页。
- 【12】张皓翔．经济实践论[预印本]．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713305>
- 【13】张皓翔．从模拟性牢笼到实践性解放[预印本]．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840399>
- 【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9-552页。
- 【15】张皓翔．从无物之阵到有物之政[预印本]．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17028>
- 【16】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8-470页。